

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

王 一 丹

内容提要 我国使用麝香的历史大约已有两千年。波斯不出产麝香,但波斯人至迟在萨珊王朝已开始使用麝香。“和田的麝香”在波斯久负盛名,一般波斯人也以为和田盛产麝香。事实上,这些所谓“和田的麝香”大都并非出产于和田,而是从中国的关中地区、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等麝香的产地通过“河西路”、“青海路”等丝绸之路传到和田,再输入波斯的。和田是麝香从中国向西输出的重要集散地。中国的麝香很可能在萨珊王朝时就已传入波斯。

关键词 丝绸之路 中西交通史 香药贸易 河西路 青海路 和田 麝香

我的诗在法尔斯我的故乡,
像麝香在和田本属寻常^[1]。

——波斯诗人萨迪(Sa'di)《果园》

如果浏览一下波斯的古典诗歌,我们会惊奇于麝香与和田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像中国的丝绸一样,和田的麝香在波斯也久负盛名。波斯有一句谚语称“带上麝香去和田”,意为“多此一举”。在波斯人的心目中和田如何盛产麝香,由此可见一斑。

波斯本土不产麝香,但波斯人喜爱用麝香则由来已久。《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2]。《新唐书·西域传》亦有类似的记述:“(波斯)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彩、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袄”^[3]。从上下文来看,两《唐书》所称的波斯,无疑是指阿拉伯人入侵之前的奉袄教(拜火教)为国教的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这就是说,在萨珊王朝时麝香已传入波斯,并被当作最为贵重的香料,用在宗教仪式中,以示对诸神的虔敬。

然而,波斯人如此称赏的麝香是何物品,它是否由中国传入波斯,与和田又有着什么关系呢?对此,本文分“麝香在中国”、“波斯人有关麝香的记载和论述”、“和田与麝香的关系”三章,加以论述。

一、麝香在中国

如所周知,在我国,麝香是珍贵的药材和香料,它是一种叫做“麝”的动物的体内分泌物。麝“似鹿而小,无角,黄黑色”^[4]。据《中国药用动物志》介绍,麝又名“香獐子”,我国境内有“原麝”、“马麝”和“林麝”三种^[5]。原麝多产于黑龙江、吉林、河北,马麝多生息在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林麝则广泛分布于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湖北、四川、贵州等地。麝是一种山地动物,栖息于针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的多岩石地带,以针、阔叶树和灌木的叶子、嫩枝以及各种野果、地衣、杂草等植物为食。

麝的视觉、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性怯，善跳跃，能在险峻的山岩及寒冷的雪地上行走，一般是白昼休息，晨昏活动。在雄麝的脐部与阴囊之间有麝腺，呈囊状，即是香囊。麝香为雄麝香囊中的分泌物，新鲜时呈稠厚的黑褐色软膏状，干燥后成为棕褐色细小粉末及大小不同的块状颗粒，俗称“当门子”。除了气味芳香以外，麝香作为药物，具有活血散瘀、催产止痛等功效。现在，麝已被我国政府列为国家珍贵保护动物，而人工养麝在我国也已获成功。获得麝香，有捕猎取香和人工养育取香两种方法。

中国古代对麝香的记述，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3世纪的战国、秦汉时代。大约著作于战国至西汉的地理学书籍《山海经·西山经》说“(翠山)其阴多旄牛、羚、麝”，郭璞注“麝似獐而小，有香”^[6]。此书记翠山远在华山之西，可谓第一次言及麝的产地。在文字学书籍方面，西汉初期学者辍辑周代以来诸书旧文增益而成的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说“麝父麝足”，郭璞注“脚似麝，有香”^[7]。东汉许慎所著字书《说文解字》则说“麝如小麋，脐有香”^[8]。在历史学书籍方面，南朝初期范晔所著《后汉书》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又有五角羊、麝香，……特多杂药”^[9]。汉代的汶山郡包括今四川省北川、汶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即所谓羌夷地区。《后汉书》的记载进一步指出麝香的产地，似乎也说明它可供药用。

麝香作为药材，在我国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药理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是一部集秦汉以前药物知识之大成的著作，它的成书年代至迟应在公元1、2世纪的汉代^[10]。这部作品对麝香的药性作详细的分析说：“麝香，味辛、温，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痼瘕，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魔寐”^[11]。南朝陶弘景曾著《名医别录》，作为对《本经》的补充，指出麝香“疗诸凶邪鬼气、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痞满、风毒、妇人产难堕胎，去面黧、目中肤翳，通神仙”，并特别提到麝产于“中台川谷及益州、雍州山中，春分取之，生者益良”^[12]。陶弘景又撰有《本经》的集注，其中关于麝的记述更为丰富：

麝形似羊，常食柏叶，又啖蛇。五月得香，往往有蛇皮骨，故麝香疗蛇毒。今以蛇蜕皮裹麝香弥香，则是相使也。其香正在麝阴茎前皮内，别有膜囊之。今出随郡、义阳、晋熙，诸蛮中者亚之。出益州者形扁，仍以皮膜裹之。一子真香，分核作三四子，刮取血膜，杂以余物。大都亦有精粗，破看一片，毛共在囊中者为胜，彼人以为志。若于诸羌夷中得者，多真好，烧当门沸良久，即好。今惟得活者，自看取之，必当全真尔。生香人云是精、溺凝作之，殊不尔。麝夏月食蛇、虫多，至寒香满，入春患急痛，自以脚剔出之，著尿溺中覆之，皆有常处，人有遇得，乃至一斗五升也。用此香乃胜杀取者。带麝非但香，亦辟恶。以真者一子置颈间枕之，辟恶梦及尸鬼鬼气。^[13]

上述文中虽不无迷信之处，但对麝的习性、产地及麝香的形成、药效的介绍已相当全面、详细，可称十分难得。此后唐、宋、元、明各代对麝香的认识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加以发展的。

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提到麝香的另一种药用：“或问隐居山泽辟蛇虺之道，……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厌之也”^[14]。南朝刘宋时，雷斅在其所著《雷公炮炙论》中将麝香分为三等：“一者名‘遗香’，是麝子脐门满，其麝自于石上用蹄尖弹脐，落处一里草木不生并焦黄，人若收得此香，价与明珠同也；二名‘脐香’，采得甚堪用；三曰‘心结香’，被大兽惊心破了，因兹狂走，杂诸群中，遂乱投水，被人收得，擘破见血流在脾上，结作一大干血块，可隔山涧早闻之香，是香中之次也”^[15]。

唐代以后，人们对麝香的认识不断丰富。《酉阳杂俎·草篇》说“瓜，恶香，香中尤忌

麝”^[16]，最早记录了古人对瓜畏麝气的认识。书中还有一段关于“水麝”的记述：“水麝脐中惟水，沥一滴于斗水中，用洒衣，衣至败，其香不歇。每取以针刺之，捻以真雄黄，则合，香气倍于肉麝。天宝初，虞人获诏养之”^[17]。

宋代唐慎微著于元符六年（公元1098年）、后又经政府医官多次增补并定名为《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政和本草》）一书，不仅详细录有以麝香入药的各种方剂，还大量引用了前人有关麝香的记述。例如，《政和本草》引唐人甄权《药性本草》而指出麝香忌大蒜^[18]，又引《杨文公谈苑》而介绍麝的习性说：“公常言商汝山中多群麝，所遗粪常就一处，虽远逐食，必还走之，不敢遗迹他所，虑为人获，人反以是求得，必掩群而取之。麝绝爱其脐，每为人所逐，势急即投岩，举爪剔裂其香，就繁而死，犹拱四足保其脐。李商隐诗云‘投岩麝退香’，许浑诗云‘寻麝采生香’”^[19]。

查《新唐书·地理志》，唐代在全国十个道之中，关内道的五个州、河南道的一个州、河东道的三个州、河北道的四个州、山南道的九个州、陇右道的九个州、剑南道的十四州都以麝香为土产品，向朝廷进贡^[20]。由此可见，当时麝香的产地似乎已遍及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河北、山西、安徽、辽宁、四川、湖北、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和自治区的某些地区。《政和本草》引用苏颂等撰于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本草图经》，就麝的产地对前人所著医药学书籍的记述加以补充说“今陕西、益（州）、利（州）、河东诸路山中皆有之，而秦州、文州诸蛮中尤多。……蕲、光山中或时亦有”^[21]，大体上与上述《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相符合。《本草图经》也分麝香为三种，一是“生香”，即雷斅所谓“遗香”；“二是脐香”，“乃捕得抓取者”；三是“心结香”^[22]。

到了明代，李时珍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的巨著，其中对前人有关麝香的知识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对于“麝”的名称的由来，李时珍解释道：“麝之香气远射，故谓之麝。或云麝父之香来射，故名，亦通。其形似獐，故俗呼香獐。梵书谓麝香曰莫诃婆伽”。这位医药学大师指出：“麝居山，獐居泽，以此为别。麝出西北者香结实；出东南者谓之土麝，亦可用，而力次之。南中灵猫囊，其气如麝，人以杂之”。他归纳麝香的药性为“通诸窍，开经络，透肌骨，解酒毒，消瓜果食积，治中风、中气、中恶、痰厥、积聚癥瘕”^[23]，可谓周详、明确而扼要。

如本文开头所说，麝香既是优良的药材，又是绝好的香料。作为香料，麝香也很早就被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抱朴子》说：“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闲，不知稼穡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厌乎兰麝，口爽于膏粱”^[24]。十分明显，至迟在公元3、4世纪的晋代，麝香与兰花已同为香料的最重要代表，而“兰”、“麝”并举则成为文人们形容馥郁芬芳的普遍习惯。例如《抱朴子》又说：“昔者西施心痛而卧于道侧，姿颜妖丽，兰麝芬馥，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踟躇焉”^[25]。《晋书·石崇传》也说：“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26]。在诗人们的笔下，“兰麝”亦屡见不鲜。南朝鲍照《中兴歌》云“彩墀散兰麝，风起自生芳”^[27]，便是众所周知的一例。

由于麝香是绝好的香料，“麝”字遂成为香气的代名词。唐代王勃说“研精麝墨，运思龙章”^[28]，陆龟蒙说“望怀沙之浦，詠遗襟之词，烟分而麝墨犹湿，绮断而龙刀合知”^[29]，所说“麝墨”指的便是香墨。事实上，据宋代晁氏《墨经》所记，三国时代的韦诞（字仲将）和北魏的贾思勰早已用麝香为药剂，掺入墨中^[30]。

古人往往还使用可以佩带于身上的麝香袋，称之为“麝膻”。例如，《南齐书·竟陵文宣

王萧子良（附子昭胄）传》说：“子良故防阁桑偃为梅虫儿军副，结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麝臄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31]。一个小小的麝香袋在官僚们的政治争斗中竟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其事虽属偶然，却也足以说明麝香之广被使用。此外，《酉阳杂俎》还提到一种称为“麝橙”的物件说：“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橙，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32]。此事虽然怪诞，却说明了“麝橙”为当时人们所常备。宋代陆游诗中还提到一种“麝枕”说：“麝枕何曾裨梦恶，玉壶空解贮啼红”^[33]。可见古人使用麝枕，正是出于对陶弘景所说以麝香“置颈间枕之，辟恶梦及尸疰鬼气”的传承。总之，如上所述，“麝臄”、“麝橙”、“麝枕”之类物品的存在，确实反映了自两晋至唐宋时期贵族官僚阶层使用麝香的风尚之盛。

二、波斯人有关麝香的记载和论述

本文在前面已经说过，波斯本土不产麝香，而波斯人却在萨珊王朝时就已使用麝香。麝香何时由境外传入波斯，史籍缺乏记载。中国两汉以来许多史学家对波斯国（或称安息）的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均有所记述，历代史书交相沿袭并多有增补，却都未述及麝香。成书于十世纪中叶的《旧唐书·西戎传》首次记述了波斯人“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之事，这是因为唐代中国与萨珊朝波斯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对波斯情况的了解因而显得更为详细、丰富，决不能由此认为唐代之前波斯人一定不曾使用麝香。

根据亨利玉尔（H. Yule）《古代中国闻见录》所述，公元440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以后不久，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著成《史记》一书，书中记中国事情，已提到“其国产丝甚旺，……又产麝香、红花、棉花、孔雀”。亨利玉尔指出，摩西此书之取材，或许是根据更早的著作家^[34]。亚美尼亚地处波斯之西北，在安息、萨珊两朝时曾长期沦为波斯的属国，其与波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时中国与亚美尼亚之间的交往多是经过波斯的境域，著名的丝绸之路便是由中国的长安经西域各地，穿越波斯全境而至亚美尼亚，再远至罗马的。因此，可以推想，在摩西《史记》著成之时，波斯人不仅早已听说过中国的麝香，而且很可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这种珍贵的香料而加以使用。虽然波斯人本身对于麝香的记载始见于萨珊王朝灭亡后的文献中，但从摩西的《史记》和中国《旧唐书》的记载看来，萨珊时期的波斯无疑早已获得并使用麝香，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产的麝香。

回历4世纪（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麻素提（Mas'udi）所著《黄金牧地》一书，也有关于麝香的记载。麻素提在此书中描绘麝的形状说，麝与别的鹿科动物在面部、颜色、形状和犄角方面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麝像大象一样有两颗牙齿长出唇外，约有一拃那么长^[35]。他还详细叙述了麝香的形成过程，并说西藏人获取麝香的方法一是采得生香，二是捕猎取香。应该指出，麻素提虽是阿拉伯人，但《黄金牧地》在波斯却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耐人寻味的是，此后千余年间，波斯人对麝及麝香的认识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丰富，但他们对“麝无角”这一点却似乎始终毫无所知，直至本世纪编撰的最权威的百科大词典《德胡达词典》在介绍麝的形状时也还是引用《黄金牧地》的描述而未指出其谬误之处^[36]。有名的《阿难德拉治词典》（成书于回历1306年，即公元1888年）甚至这样沿用前人关于麝的描述说：“它的前肢比后肢短，有两颗歪斜向下的门牙；它的角是白色弯曲的，长得可以碰到臀部，上边有小孔，用来呼吸空气”^[37]。这说明，由于波斯本土自古不产麝，而麝香又长期为波斯人视为珍贵的物品而使用，所以麝遂成为一种神秘的动物而被描绘

得奇形怪状，引起人们对它的不同寻常的兴趣。

《伊朗文明》杂志第15期刊登了两篇专门介绍香料的文章。一篇是回历4世纪（公元10世纪）伊朗名医曼德维耶·伊斯法罕尼（Mandviye-ye Isfahāni）用阿拉伯文写的《论医学原理和香料制作》^[38]，另一篇是年代稍晚的佚名作者所著波斯文的《阿拉伊香谱》^[39]，后者基本上是对前者的翻译和引述。这两篇文章对麝香的种类、产地及各自的特点都有详细的论述。此外，雅库比（Ya'kūbi）的《阿巴斯人史》（公元875年前后）^[40]、阿维森那（Ibn-e Sina）的《医典》^[41]（成书于回历414年，即公元1023年）、阿布·曼苏尔·哈尔维（Abū Mansūr-e Haravī）的《药理学大纲》^[42]（作于回历5世纪初，相当于公元11世纪）、伊斯玛伊尔·哈桑·朱尔占尼（Ismā'il Hasan-e Jurjāni）的《花刺子模国王的宝库》^[43]（作于回历504年，即公元1110年）、伊本·巴伊塔尔（Ibn Al-Baytar，公元1197? -1248年）的《药草志》^[44]等著作也都有关于麝香的记载。另外，公元1844年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的阿吉利·霍拉桑尼（Aghili-ye Khorāsāni）的《药物宝库》一书对麝香的记载也很有价值^[45]。至于今人谈及麝香的著作，则有曼努切赫尔·艾米力（Manūchehr Amiri）所著《药物疑难词典——对〈药理学大纲〉的研究》^[46]和穆罕默德·阿巴第·巴威勒（Mohammad Ābadi Bavil）所著《奇珍异宝录——伊斯兰教城市及附近地区的物产》^[47]等，可供参考。

根据上述各种文献的记述，输入波斯的麝香大致有南、北两个来源：北路是从秦和突厥斯坦（有时又称契丹与和田）输入，南路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输入。此外，介于南、北之间的西藏地区所产的麝香在波斯也很有名。事实上，阿吉利·霍拉桑尼在《药物宝库》中就指出：“麝生息在秦、契丹、西藏、突厥斯坦、库特康拉以及尼泊尔、巴赫莱治、穆朗、朗普尔这一片广阔地域上互相连接的群山之中，人们从这些山地把麝香带往世界各地。例如孟加拉的麝香得自穆朗、朗普尔和尼泊尔的山中，伊朗、霍拉桑和罗马的麝香则从秦、契丹和西藏而来，或从陆路，或经海路”^[48]。霍拉桑尼又说：“按产地分，最好的麝香是契丹的，其次是西藏的，其次是库特康拉的，其次是尼泊尔的，再其次才是其它地方的。……有人把麝香分为印度产的和突厥产的两种，突厥产的胜印度产的。突厥产的又分几种，其中契丹产的胜鞑靼产的（鞑靼产的略有臭味），鞑靼产的又胜其它的；印度产的麝香之中，尼泊尔产的最好，其次是朗普尔产的，然后是其它的。”^[49]

对麝香产地的分类，各家说法不一。雅库比说：“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麝香，再其次是中国麝香。中国最好的麝香来自广府（Khānfū）……”^[50]。阿维森纳说：“据说最好的麝香产于西藏，又据说产于秦和吉尔吉斯，印度产的次之。”^[51]《论医学原理与香料制作》和《阿拉伊香谱》则把麝香分为八种，它们分别来自：1、秦；2、西藏；3、图斯米；4、尼泊尔；5、契丹；6、吉尔吉斯；7、克什米尔；8、海上。两文的作者认为，八种之中以来自秦的最为名贵、芳馥，多属王室所有，常人难得见到^[52]。他们所称来自“海上”的一类麝香是指经过“地中海、阿曼湾或别的海域、河流”传入的^[53]。《花刺子模国王的宝库》中的分类与上述两文相同^[54]。但是，纳西鲁丁·图西（Nasir-oddin-e Tusī）所著《伊儿汗的珍闻录》（著于回历7世纪，即公元13世纪）则认为“最好的麝香是和田产的，其次是西藏的、鞑靼的、吉尔吉斯的和克什米尔的，海上来的最差，因为海面蒸发的水气减损了它的药力”^[55]。尽管分类的方法不一，但都不出阿吉利·霍拉桑尼在《药物宝库》一书中所指的地域范围。

长期以来，波斯人对鉴别麝香的真伪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药物宝库》说：

试验麝香的方法，可以在手掌中放一小块麝香，抹上唾液，麝香若化开就是真品，若成团则有掺假；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és）说纯麝香细研后置于有体液的容器中，一小时后其重量便会增加。另一种试验方法是将容器置于火上，撒少许麝香于其中，若发出芳香气味，就是真的，反之则假。还有一种方法是取一枚针先刺一下蒜，再刺一下麝香，闻一闻针头，若发出蒜味便是假麝香，若发出香味则是上好的真品。[56]

又如，12世纪时阿拉伯人阿布尔—法德尔·贾法尔（Abū'l-Faḍl Dja'far）在其所著《鉴别好坏商品和伪造仿制商品须知书》（1175年）中说：

在那些药品之中，最常见的伪造或仿制品是麝香。如果是用瓶装，那就必须检查一下封口的印鉴，并仔细观察上面作标记者是否是一位诚实可靠之辈。然后再打开一下容器，查看其颜色是否呈淡红色，气味是否浓郁而宜人，味道是否有一定的苦涩。因为在吃麝香时，苦味也并不特别强烈。首先要检查麝香囊的外部，然后再打开鉴定其内部。人们经常要往麝囊中投放铅和铁，或者是先取其中的部分麝香，这一混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57]

总之，波斯是一个喜爱香料的民族，由于长期需从境外输入麝香，遂使波斯人及其临近的阿拉伯人对识别麝香的产地及其真伪给予格外的重视。

波斯出产许多著名的香料，也重视香料的制作。《阿拉伊香谱》的作者便用很大的篇幅专门介绍了用麝香与其它香料（如龙涎香、沉香、樟脑、蕃红花等）制作合成香料的方法；14世纪的努韦理（Nūwayrī）在《香料的制成》一文中更是不厌其详地记述了用麝香与琥珀制作复合香料“噶利亚”的过程[58]，显示了波斯人民在制作香料方面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经验。

三、和田与麝香的关系

从波斯的许多古典诗文的记述看来，在输入波斯的麝香中，“和田的麝香”可以说是最有名的，波斯人甚至称麝为“和田之鹿”。但是，在中国方面，我们遍查述及和田的各种史书文籍，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与麝香有关的记载。那么，和田与麝香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一带，是汉代西域的于阗国。如所周知，和田素以盛产美玉和精致的丝织品而闻名。《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59]。据调查，和田的玉石产于城东的玉龙喀什河和城西的喀拉喀什河两处，自古就很有名。考古学家们断定，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中原的王公贵胄们就已大量使用以和田所产玉料制成的各种玉器了[60]。和田的桑蚕最初则是从东方传入的。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东晋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东方邻国的公主下嫁于阗国，将蚕种秘密藏在帽内携带到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才种桑、养蚕，并纺丝织绸[61]。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A. Stein）在和田附近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属公元8世纪）中发掘出的一块画版所反映的内容也与上述这个故事相吻合[62]。其实，养蚕业至少在公元3世纪的魏晋时代就已传入和田。斯坦因于1901年和1906年在和田以东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古代桑园的遗迹，根据出土的佉卢文文书可以推断，遗址的年代属于公元的最初三个世纪间，当时这里为精绝国所统治[63]。劳费尔（B. Laufer）认为，在萨珊朝末年，养蚕抽丝的方法还经由于阗向西远传至波斯[64]。

然而，如前面所说，自古迄今，中国的书籍却毫无关于和田产麝香的记述。从清代所编《和田直隶州乡土志》的各方面的记述来看，和田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地方，除玉石不论，每年出产大量棉布、丝绸、毛毯、皮货和桑皮纸等商品[65]，但不包含麝香。《乡土志》所记和田的家畜有羊、马、驴、牛、骆驼，而野兽则只说以狐与山羊为多，没有提到麝或别的野生动物[66]。遍查和田附近的皮山、洛浦、于阗等县的《乡土志》，也都没有关于麝和麝香

的记载^[67]。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萨米（Sami）一百多年前在其所著《突厥名物词典》一书中却提到：“和田是东突厥斯坦的一座名城，这里的百姓巧于纺织，丝绸和棉布贸易很繁荣。和田的特点之一是在它附近的山野上有麝群出没，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以输出麝香闻名于世。……由于和田位于古代中国与伊朗贸易交通的要道上，因此也以商业繁荣而闻名”^[68]。和田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南抵昆仑山，与西藏相邻。在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广阔高原上，生长着众多的野生动物。据《中国药用动物志》所记，新疆、青藏高原都产麝^[69]。《西北自然地理》一书则更具体地指出，我国西北产麝的地域有昆仑山、祁连山、青海湖、贺兰山和秦岭等地^[70]。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和近代文献中没有关于和田产麝的记载，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和田附近地区产麝的可能性。

但是，和田与麝香的关系看来远不止于此。中国自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以后，中原与西域诸国及印度、波斯的交往便日益频繁起来，而于阗则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71]《西域传》中的所谓南山，即是祁连山。这就是说，南道从罗布泊附近沿祁连山、昆仑山之北，西行至叶尔羌，越过帕米尔，可通往大月氏和安息，而于阗正位于昆仑山北麓，是由南道西行的必经之地。

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以后，前往西域的路径已由两条发展到三条^[72]，其中的南道仍然是“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73]。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则指出从敦煌到西海有三道，北道至拂菻，中道至波斯，南道至北婆罗门，其中南道是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而度葱岭^[74]。事实上，中国历代与波斯的交往，在葱岭以东地区常常是采取经过于阗的古老的南道。《魏书·于阗传》记载：“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子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显祖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自后每使朝献”^[75]。这是中国北魏王朝与波斯交往史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它的发生地点正是在于阗。

古代中国从中土前往西域，一般要以凉州、甘州、肃州和沙州为桥梁，这就是祁连山北的所谓“河西走廊”。如前所述，祁连山、贺兰山、秦岭（为古代秦州、文州、雍州的辖境）这一片连绵的山脉中有麝。这些出产于中西交通要道上的麝香，通过丝绸之路，经于阗向西传入波斯，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初年（1271—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经丝绸之路由西向东旅行至元朝政府统治下的“西凉国”时，还亲眼看到了麝。《马可·波罗游记》说：

在这个国家（西凉国），又出产最优良和价值高昂的麝香。生产这种麝香的动物，是一种名叫香獐的动物。它的皮毛与一种较大的鹿相似，尾和脚很像羚羊，但头上不长角。它有四个突出的牙齿，长约七厘米，上下牙床各长两个，细长色白，宛如象牙。就整体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看的动物。取麝香的方法是每当月圆之夜，这种香獐的脐部有一袋凝固的血块，专门猎取麝香的人利用星月的清辉，割下这个皮囊，晒干。这样美好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最为浓郁宜人。他们捕得大批的香獐，肉也相当可口。马可·波罗曾把晒干的香獐头和脚带回威尼斯。^[76]

此处所说的西凉国，为元时的西凉府，即今日的武威，是河西走廊上的要站。阿里·阿克巴尔（Ali Akbar）也曾提到陕西的麝香说“这个省中的城市有 Kinjanfu（京兆府，今西安）、Kanju（甘州，今张掖）、Sekchou（肃州，今酒泉）和 Dinkju（对音定州），在这几个城

中盛产麝香”^[77]，可为以上所引马可·波罗的记述作佐证。这两位旅行家的记述说明，河西走廊上出产的麝香确实引起了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的注意。

除了河西走廊以外，从中原到西域去的桥梁还另有两条。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其一是从宁夏一带的沙漠西行的一条路，也称‘居延路’；其二是东西横穿青海省的一条路，称为‘西羌路’或‘青海路’。……后者从黄河河畔的兰州附近向青海的湖岸前行，再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隅的罗布泊地方，再从这里以天山南麓地带为目标，并与上述的南道会合后向着于阗前进。这条路线的东端不仅连接着关中盆地，而且还连接着蜀，即四川盆地。自公元5世纪到7世纪，从活跃于东西方中转贸易的吐谷浑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条路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的例子”^[78]。

中外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也证实了“青海路”的存在。中国学者夏鼐以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为依据，指出从公元4世纪末至7世纪初，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的上，这条稍南的交通路线的重要性在5世纪时可能不下于河西走廊。^[79]夏鼐还以法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勇（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宋云（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等人的行程为例，阐明他们都是经青海西行的，此后，乾陀罗人阇那崛多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由于阗等地经青海东行赴长安的。^[80]此外，日本学者冈崎敬也指出，宋云及其同行者惠生等人是经过从5世纪开始作为北魏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中继站的吐谷浑，然后经佐末城、捍摩城到于阗国的。^[81]

正如“河西路”横穿甘肃地区一样，“青海路”横穿青海境内，这里也正是麝的主要产地。近代所称青海著名的“四大宝”，麝香便是其一，青海曾年产麝香一百两以上。有关“四大宝”的民谣说：“青海羊毛是特产，蛋吉大黄走南洋，鹿茸都是八个叉，要说价钱数麝香”^[82]。

马可·波罗游历到青藏高原时，曾有这样的记述：“这地方出产一种麝，并且数量很多，所以整个地区充满着麝香的味道。……这种动物本地话叫加德里（Gudderi），是用狗去猎取的”^[83]。阿里·阿克巴尔也曾提到这种猎狗说：“在西藏山区有一种良狗，西藏人用它向皇帝进贡。在土耳其苏丹也有这种狗，被称为萨珊尼，据说是西藏种。麝就是用这种狗去猎取的”^[84]。不难想象，西藏种猎狗在土耳其被称为萨珊尼（即萨珊的），这本身就透露了西藏、波斯、土耳其三个地区之间的往来与关系。

中西交通史上的“青海路”贯穿今青海省，而且还连接着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85]我们知道，关中与四川也是麝的产地。这也就是说，虽然和田不一定出产麝香，但是由于“河西路”、“青海路”等丝绸之路的存在，它可以成为古代中国境内各地出产的麝香向西输出的集散地。四川、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出产的麝香都可以由各条丝绸之路传至和田，再从和田西向传到波斯。由于它们多从和田传入波斯，所以往往就被称为和田来的麝香，而一般波斯人也就不渐渐地以为和田盛产麝香了。这种情况就像伊本·巴伊塔尔在《药草志》中指出的那样，人们把来自突厥地区的大黄称为突厥大黄，同样，把经由伊拉克传来的麝香称为伊拉克麝香^[86]。

中国的麝香传入波斯，大约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朝廷馈赠的礼品，二是作为胡商贩运的货物。尽管两者在中国古籍中都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据伊本·白图泰（Ibn-e Batūte）所述，回历743年2月17日（约为公元1342年），他受印度德里素丹阿布·木扎希德·穆罕默德·沙之命出使中国，原因是中国国王送给素丹男女奴隶百名、花缎五百匹，以及镶宝锦

花五件、麝香五曼尼。素丹收到这批礼品后，决定用更好的物品回赠，所以派伊本·白图泰等人将它们携往中国。^[87]由此可见，麝香确曾与丝绸一同被中国帝王作为礼品馈赠外国的君主。波斯自安息、萨珊两朝开始，与中国的汉、魏及以后各代都有频繁的使节往来。马尔柯姆（Malcolm）《波斯史》与麻素提《黄金牧地》中有中国皇帝遣使献方物的记述，^[88]中国史书中记载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89]实际上，中国历代皇帝在接受外国使臣所贡方物之后，无不以价值相当或更为贵重的各种礼品回赠，对波斯当然也不例外。《阿拉伊香谱》和《药物宝库》的作者都提到中国的麝香很名贵，常人难得一见，往往是被当作礼品献给当地的统治者，珍藏在王室的库府之中。^[90]因此，不能排除古代中国帝王以麝香赠送波斯君主的可能性。

当然，麝香传入波斯可能更多是通过商人的贸易。波斯商贾素以善能辨识宝物著称，特别是隋唐以后，他们或经陆路或由海道来到中国经商运货，往来活跃于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重要都邑、城市及港口，形成著名的所谓西市胡店和波斯邸，这在唐人的著述中常有提及。例如，裴铏《传奇》记崔炜之事说：“（崔子）遂归广州……抵波斯邸，潜鬻是珠”^[91]。卢肇《逸史》记卢、李二生之事说：“（卢生）乃与一柱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92]又李复言《续玄怪录》记杜子春故事说：“（老人）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93]。诸如此类的记述，举不胜举，而波斯商人活泼、有力的商业活动则由此可见。据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当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尺，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94]。这充分说明，香药贸易是胡商活动中重要的一项。伊本·库达特拔（Ibn Khordāzbeh）在《道里郡国志》（作于公元844—848年）中列举中国的出口物资说“至于东洋所提供的出口物品，有中国的白绸、彩绸、锦绸、麝香、芦荟、马鞍、貂皮、陶瓷、麻醉品、肉桂、茛菪等”^[95]，其中的麝香仅次于丝绸而名列前茅。

另外，唐代樊绰所著《蛮书》（又名《云南志》）记述当时云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说：“（银生城）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闍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96]。所记“波斯”指马来波斯、南海波斯，还是指西亚波斯，学术界争论已久，至今未有绝对的定论。但是，上述广州市内的波斯邸和广州江中的波斯舶既属西亚的波斯，则此处所记“波斯”似亦应指西亚伊朗的波斯。总之，《蛮书》的这一记述是说明唐代中国麝香通过国际贸易流入波斯的极好的例证，而麝香在这里甚至与黄金并称为“贵货”。

由于中国与波斯海上贸易的发展在时代上晚于陆上的丝绸之路^[97]，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的麝香传入波斯最早应该是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的，而和田则可称为其中的枢纽之地。事实上，中国特产经陆上的丝绸之路西向传入波斯乃至更远的罗马，事例甚多。劳费尔指出，中国的桃种在公元前二百年或一百年就传至波斯，由波斯传到亚美尼亚，并在公元第一世纪传到更远的希腊和罗马。^[98]此外，他还列举波斯人所知的中国动植物产品有方竹、丝绸、杏、肉桂、姜、莪术、黄连、大黄、无患子、庵摩勒、蜀葵、玫瑰、檀香、桦、茶、土茯苓、芒果及纸等^[99]。我们认为，产于我国各地的麝香也应是波斯人所知道的中国许多神奇物品中重要的一项，它至迟在萨珊王朝时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

在波斯人的心目中，与其它中国物产相比，麝香似乎是最令人悠然神往的。中国古代诗

人曾有“麝过春山草自香”^[100]的赞叹，波斯诗人也常常陶醉在麝香的馥郁中。这里引用十三世纪波斯著名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束：

闺中的佳人，收起你装满香料的绣囊！
麝从远方来了，从和田的原野上，
带来了它那迷人的芬芳。^[101]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于北京

注：① 萨迪：《果园》（张鸿年译）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旧唐书》卷198，531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③ 《新唐书》卷221，625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④ 《辞源》（修订本），355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⑥ 《中国药用动物志》第一册，287—292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⑦ 袁珂：《山海经校译》，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⑧ 《尔雅注疏》，122页，《四库备要·经部》，上海中华书局据阮刻本校刊。

⑨ 王筠：《说文句读》卷19，1345页，上海古籍书店据清同治四年王氏刻本影印，1983年。

⑩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58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⑪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52—54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16（兽部上品“麝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平阳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1957年。

⑳㉑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279页，中华书局，1980年。

㉒㉓ 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184、94页，中华书局，1981年。

㉔同㉑。今本段成式《酉阳杂俎》未见关于水麝的文字，但宋苏颂著《本草图经》、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都引有此段记述，李时珍称“此说载于酉阳杂俎，近不复闻有之”。

㉕ 《新唐书》卷37（地理一）965—972页，卷38（地理二）986页，卷39（地理三）1005—1006、1021—1023页，卷40（地理四）1032—1037、1040—1045页，卷42（地理六）1081—1092页，卷43（地理七下）1125页，中华书局，1975年。

㉖ 《本草纲目》兽部卷51“麝香”，人民卫生出版社（据1603年夏良心江西初刻本校点），1982年。

㉗㉘ 葛洪：《抱朴子·外篇》89、126页，《四部备要·子部》，上海中华书局据平津馆本校刊。

㉙ 《晋书》卷33，1008页，中华书局，1974年。

㉚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271页，中华书局，1983年。

㉛ 王勃：《秋日饯别序》，《全唐文》184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

㉜ 陆龟蒙：《采药赋》，《全唐文》8398页。

㉝ 《墨经》13页，《丛书集成初编》（一四九五），中华书局，1985年。

㉞ 《南齐书》卷40，702—703页，中华书局，1972年。

㉟ 《剑南诗稿》卷第43（读香奁集诗戏效其体），《陆游集》第三册1088页，中华书局，1976年。

㊱㊲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7、101页，中华书局，1978年。

㊳㊴ Masūdi, Moravvej-ozzahab, 68—69页，埃及阿拉伯文版，参见《德胡达词典》（Loghat-name-ye Dehkhoda）“麝香”条。

㊵ Farhang-e Ānanderāj；“麝香”条。

㊶ Mandviye-ye Isfahāni, Resalat fi Osul-al-teyb-o Al-morakabat-al-'atriye, 见《伊朗文明》（Farhang-e Iran Zamin）第15期224—253页，德黑兰，1968年。

㊷㊸ 'Atr-nāme-ye' Alāyi, 见《伊朗文明》第15期254—276、259页。

㊹㊺㊻㊼㊽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67、315—319、67、下册700—707、上册292、上册47页，（法）费瑛编，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年。

㊾㊿ Ibn-e Sina, Ghanūn, 第二册213页，德黑兰，信使出版社，1985年。

㋀ Abū Mansūr-e Haravi, Abniya an Hag-hāyegh-el Adviya, 326页，德黑兰，1967。

㋁ Isma'il Hassan-e Jurjāni, Zakhira-ye Kharazmshāhi, 200—202页，德黑兰，1973年。

㋂㋃㋄ 'Aghili-ye Khorasāni, Makhzan-al-adviya, 831—833、832—833、831—832、831—832页，Calcutta, 1844年。

㋅ Manūchehr Amiri, Farhang-e Dāruhā-o

Vajhehā-ye Doshvāryā Tahghigh darbāre-ye Ketab-ol-Abniya an Haghāyegh-el Adviye, 370-371页, 伊朗文明基金出版社, 1974年。

①⑦ Mohammad Ābādī Bavi, Zarāyef-o Tarāyef, 269-272页, 大不里士, 1978年。

①⑧ 同①⑦, 225—229页, 同①⑦, 257—260页。

①⑨ Nasir-oddin-e Tūsi, Tansūkh-nāma-ye Ikhāni, 248页。转引自《奇珍异宝录》271页。

①⑩⑪ 《汉书》卷96上, 3881、3872页, 中华书局, 1962年。

①⑫ 参见夏鼐《汉代玉器》, 王仲殊《秦汉考古》,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76、383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①⑬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021—1022页, 中华书局, 1985年。

①⑭ 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 45页, 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 1987年。

①⑮ 同①⑭, 60、72页。

①⑯⑰⑱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 367、369—371、364—398页, 商务印书馆, 1964年。

②⑰ 《新疆乡土志稿》694、693页,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

②⑲ 同②⑰, 662—665、713—714、749—750页。

②⑳ Sami, Ghamās-ol Alām-e Torki, 转引自《德胡达辞典》“和田”条。

②㉑ 韩宪纲:《西北自然地理》26、104、107、128、202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年。

②㉒ 杜佑:《通典》卷191, 1027页, 商务印书馆, 1935年万有文库版。

②㉓ 同②㉒, 又见《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 859页, 中华书局, 1963年。

②㉔ 《隋书》卷67(裴矩传), 1579页, 中华书局, 1973年。

②㉕ 《魏书》卷102, 2263页, 中华书局, 1974年。

②㉖②⑷ 《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70、141页,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年。

②㉘②⑸ 《中国纪行》(张至善等编译)96、122页, 三联出版社, 1988年。

②㉙②⑹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8—9页,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年。

②㉚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94页, 科学出版社。

②㉛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考古学论文集》132—134页, 科学出版社, 1961年。

②⑴ 冈崎敬:《法顯·宋雲の歩いたパミール越えの通路》, 《(増補(東西交渉の考古学)497—498页, (日本)平凡社, 1980年。

②⑵ 同②⑴, 80—81页。

②⑶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456—457页,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

②⑷ 《史记·大宛列传》:“安息王)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后汉书·西域传》:“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 (安息国)遣使献师子、符拔”。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 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 时谓之安息雀。”

《周书·异域传》:“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 其王遣使来献方物”。天和二年(公元567年), 其王遣使来献。”《隋书·西域传》:“炀帝遣云骑尉李显通波斯, 寻遣使随显贡方物。”

《隋书·何稠传》:“波斯尝献金绵锦袍, 组织殊丽。”

另据《魏书》的《西域传》及《帝纪》所记, 全北魏时期, 波斯国使者来中国朝献共有十次。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89—95页。

②⑸ 同②⑴, 258页; 同②⑴, 832页。

②⑹ 《太平广记·神仙三四》21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

②⑺ 《太平广记·神仙十七》119页。

②⑻ 《太平广记·神仙十六》109页。

②⑿ 转引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4页, 三联出版社, 1957年。

③⑰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280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认为《云南志》(即《蛮书》)此处提到的波斯是马来波斯而非伊朗波斯, 章鸿钊与张星烺等人对此加以辩驳, 否定了马来波斯说, 而向达等则认为南海波斯。参见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295页; 章鸿钊《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1—13页,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5年;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189—194页; 向达《蛮书校注》164—165页, 中华书局, 1962年。

③⑱ 参见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 海洋出版社, 1986年。

③⑲ 许浑:《题崔处士山居》, 《全唐诗》6107页, 中华书局, 1979年。

③⑳ 《哈菲兹诗集》(Divān-e Ghazaliyat-e Hafez-e Shirazi) 237页, 德黑兰, 萨菲·阿里沙赫出版社, 1987年。

(作者单位 东语系 责任编辑 华祝)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ncient document of Tu-Chih Zou-Chao (A.D.673), recently unearthed in Turfan basin and restored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Torhru Ohtsu, provides us with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tional budgets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On the basis of this document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data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udget, its foundation as well as its chang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Exportation of China's Musk to Persia Via Khotan

by Wang Yidan

The history of musk used in China goes back to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Persia did not produce musk, but the Persians began to use it as early as in the ancient Sassanian dynasty. The so-called "Khotan musks" were very famous in Persia. The assumption that Khotan abounds with musks has long been held in Persian literature. Nevertheless, musks were not produced in Khotan.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such as Guanzhong, Sichuan, Qinghai, and Tibet. Through the famous silk roads, such as Hexi Road and Qinghai Road, musks were brought to Khotan and then to Persia. Since early times, Khotan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collecting and distributing center, as well as a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General Tendency in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nomics

by Wang Zhiwei

While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s in the West is undergoing a cycle of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there is a clear tendency of "reunio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eparation." Thi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nomics. The main feature of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mergence of the two major schools of though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The divorce and unanimity among different schools of economic theory are just a dialectical manifestation of its general development. So are the particular emphasi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economic policies.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 of this theoretical evolution is the revolution in its methodolog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eories of Fukuzawa Yukichi and Liang Ch'i-Chao

by Xu Jianmei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ukuzawa Yukichi and Liang Ch'i-chao in their political views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gradual reform, and the main power force of innovation. Though they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 they both hope to learn from the West in the political reform. They also want to maintain a strong, centralized govern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order. Hence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theories.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not only led Japan and China onto different roads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caused Fukuzawa Yukichi and Liang Ch'i-chao to modify their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later years.